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亚常识重建:机遇、挑战和对策

励 轩

(四川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中亚研究基础的薄弱、当代中亚研究的敏感以及未来学术发展的不确定性,都不利于中国学人进行中亚常识的重建。利用好中国中亚和海外中亚地区两个智力资源库,将有利于部分克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实现中亚常识的重建。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中亚;常识重建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6)06-0026-04

自从2013年中央提出要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后,“一带一路”倡议迅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知识界也立刻对这一国家战略构想做出热烈回应。从2014年1月到2016年4月,中国知网共收录近1.2万篇题目包含“一带一路”的各类文章。然而,当知识界在热烈讨论“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可以明显感受到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储备是十分有限的。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中亚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在我国长期是受到忽视的。以北京的高校为例,北京大学近年才开设土耳其语专业,而另外三所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没有开设除俄语以外的任何与中亚有关的语言课程,甚至连我们自己的维吾尔语课程也只有中央民族大学一处有。这种对中亚地区的忽视,与我们对欧美的极端重视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咎涛博士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视野主要地集中于西方、海洋文明(或曰蓝色文明)、发达国家的身上;所以,学英语、去美国留学一直是主流。体现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上,就是长期偏重于西学”^{[1][15]}。袁剑博士则认为“我们对中亚地区的认识不足,与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的全球视野,与我们在处理好自身问题的基础上认识和面对来自域外的机遇与挑战的反应能力是难以契合的。”^{[2][13]}进一步讲,两位学者都提出我们应该重建对中亚的常识性认识。本文将沿着他们的思路,探讨中国学者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建中亚常识性认识中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可能的对策。

一、作为知识富矿的中亚地区

中亚的定义一般分为狭义中亚和广义中亚。前者包括苏联时期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后者的定义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亚五国的范围延伸到蒙古、中国的西藏和新疆、汉地西北、东北伊朗、南西伯利亚、印度北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些学者认为,后者更适用“大中亚”(Greater Central Asia)这一称呼^[3]。无论是狭义的中亚还是大中亚,显而易见,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众多学者心目中的亚洲腹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将略广于大中亚的区域称为枢纽区域(Pivot Area)^{[4][312]},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则将中亚视为世界历史和文明的中心^{[5][44]},以凸显这块区域在历史地理中的重要地位。

因为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中亚地区在前工业化时代发生了大量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和人类活动。就以改变

收稿日期:2016-09-10

作者简介:励轩(1985-),男,浙江宁波人,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特聘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边疆研究。

传统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而言,就包括匈奴崛起和此后数百年的匈奴—汉朝战争、五胡乱华、隋唐和突厥战争、契丹兴起、蒙古西征、清朝—准格尔战争。所有这些重大事件都改变了传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进程,并且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对传统中国的历史记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尽管中亚的战略地位较以往有所下降,但该地区的变动还是对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存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外蒙古的独立使得清代奠定的帝国基本版图不再完整,而西藏和新疆在中华民国时期的疏离使国家的领土完整遭受持续性挑战。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事实上与苏联在中亚地区存在着长期对峙,双方一度沿着中国西北边界屯驻重兵。所有这些都构成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超越中国和中亚关系的视角,我们还可以发现中亚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中亚河中地区崛起的突厥化蒙古贵族帖木儿在14世纪通过征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1402年,帖木儿在安卡拉战役中大败如日冲天的奥斯曼帝国,将其苏丹俘虏^{[6](197-201)},阻挡了后者东扩,也减轻了伊斯兰文化对基督教欧洲侵蚀的压力。如果不是帖木儿在东征途中去世,帖木儿帝国将跟东方的大明发生一场改变东亚地缘政治的战争。在帖木儿之后,他的五世孙巴布尔则从中亚进发征服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进入20世纪,奉行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苏联在其统治的中亚地区实行民族识别的实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抛弃了贾迪德运动(Jadidism)所倡导的泛突厥主义,从而防止了统一突厥语伊斯兰国家的出现,为今日中亚五国版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新疆的民族识别提供了样本。1979年开始,苏联对阿富汗长达10年的入侵,由于深陷战争泥淖,苏联国力遭到大大削弱,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个世界级霸权国家的崩溃。此后,世界大国对中亚事务的觊觎或干涉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停止,2001年,美军对阿富汗的入侵又让中亚地区再次成为全球的焦点,而这场战争已经部分地改变了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并对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冲击。

各国政治力量在中亚地区的碰撞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考古遗迹和书面记载,给了学者们通过发掘这些宝藏以重新考量历史的机会。仅以蒙古地区为例,就拥有大量与古代中国有关的考古遗迹。19世纪末由俄国考古学家雅德林采夫(Nikolay Yadrintsev)在蒙古所发现的鄂尔浑碑铭(Orkhon inscriptions)^①,是两块纪念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突厥贵族阙特勤及毗伽可汗的碑文。两块碑均刻有汉文和古突厥文,汉文应是唐人所做,古突厥文则是毗伽可汗之侄夜落纥特勤所撰。汉文内容和古突厥文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着重讲述唐朝和突厥的友好交往,而后者则记录了毗伽可汗对唐朝的负面看法^{[7](861-876)}。这两块碑文的发现,使得学术界可以重新审视当时唐与突厥的关系以及突厥贵族对两者关系表述的处理。蒙古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转型后,改变了原来封闭的状态,使得域外学者去国立中央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挖掘历史遗留下来的巨量一手文献变得不再困难^[8]。2007年美国藏学家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在一处蒙古国档案馆发现了《1913年蒙藏条约》(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and Tibet)藏文原版^[9],不仅解决了该条约是否存在藏文版的历史疑惑,也使得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辛亥革命后波诡云谲的中国边疆政治。

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地区的大规模政治转型,不仅让域外学者可以有更多机会利用蒙古国的档案遗存,也让许多学者可以更便捷地接触原苏联中亚五国的档案。在当下海外的新疆研究中,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使用中亚五国档案去还原新疆历史方面的作用。哈佛大学博士大卫·布罗费(David Brophy)的博士论文探讨维吾尔民族主义的起源,在这篇论文中,他使用了哈萨克斯坦国家档案馆的一手文献去厘清七河地区(Semireche)塔兰奇人从“十月革命”前到20世纪20年代的变化。此外,他还使用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去处理俄国突厥斯坦边界清俄官员之间的关系^{[10](8-9)}。2015年的费正清奖获得者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莱恩·瑟姆(Rian Thum)在其获奖著作《维吾尔历史的宗教路径》中,也使用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必如尼东方研究所(Al-Biruni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的档案^{[11](257)}。

中亚所蕴藏的知识富矿绝不仅仅只有历史遗存或文献,对于从事现实问题的学者来说,正在中亚地区发生的事本身就是亟待开采的知识矿产。在当下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和个人要去中亚地区投资或开拓市场,必然要牵涉到摸清中亚地区现实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并需要紧跟中亚地区社会发展的走向。可以说,中国社会对中亚地区现实状况的强烈知识需求甚至远胜于对历史遗存和古典文献,这对意欲从事当代中亚区域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好消息。

二、中亚常识重建的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希望更加积极参与周边国际事务的愿望。不过这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很

① 即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

容易招致大国对中国试图改变地区秩序的担忧。美国已经注意到中国在中亚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并开始研究如何应对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增强^[12]。俄罗斯和中国的高层有着比美国更亲密的关系,而且目前莫斯科和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在中亚事务上有较多合作。但是中亚传统上深受俄罗斯的影响,其在中亚五国还是有着较大的利益存在。伴随着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日趋增强,俄罗斯可能因此感受到地缘政治压力。当然,美俄现实的政治忧虑是否会成为阻碍中国学者重建中亚常识的一个因素,还难以研判,即使会成为阻碍因素,也很难说是主要的。

相比于来自美俄的政治压力,中亚研究基础的薄弱反倒是一个更值得我们忧虑的现实。尽管在大中亚地区并没有太多的战略利益,但美国对该地区的整体性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已有近七十年历史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有能力开设中央欧亚地区几乎所有语言课程,汇聚了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跨学科人才,成为向政界、学界、军方、商界输送中亚区域人才的重要机构。而正在积极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显然没有做很好的知识准备,虽然我们有几个研究中亚的基地,却鲜有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专家能够同时掌握俄语和中亚当地的语言文字,很多学者不得不依靠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来获取关于中亚地区的信息,这为挖掘中亚这座知识上的富矿带来了巨大挑战。

更大的挑战还不是我们在工具上准备不足,而是这座知识富矿本身也是险象环生之地。目前中亚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由威权政府统治,他们并不太喜欢学者碰触本国或地区的当代政治议题,即使是严肃的学术研究看起来也不被鼓励。2015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以政治学不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模式为由宣布禁止教授该门课程,现在该科目已经被替换为专讲乌兹别克斯坦模式的“建设乌兹别克斯坦民主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国外的研究者则可能因其研究内容的敏感而会被直接禁止入境。同样是在去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禁止俄国人类学家谢尔盖·阿巴辛(Sergei Abashin)入境,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理由,但应跟他所从事乌兹别克斯坦民族问题研究有关^[13]。以上还不是最坏情况,2014年,有一位留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塔吉克斯坦籍博士生回到塔吉克斯坦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时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和间谍罪^[14]。

这些学者在中亚所碰到的窘境不一定就是中国学者就会面对的,不过他们的遭遇却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要让“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光是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地区存在的哪些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可能会对中国企业在中亚的投资或市场开拓构成危险,才是必须被认真检视和探讨的。如此一来,研究当代中亚地区的中国学者也需要直面该地区并不太乐观的学术环境,将自己可能要冒的政治风险考虑进来。

除了政治风险,从事中亚地区研究的学者还得考量区域研究未来的发展前景。以美国学术界为例,区域研究受到来自政府和各类民间基金会的支持在日渐减少。一方面,传统学科抢夺了区域研究的地盘,毕竟一位政治学家可以同时是一位中亚研究者,并能在政治学和区域研究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一位中亚研究者却未必会是一位政治学家,论文发表也较受局限。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区域研究的需求在下降。这与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此区域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有所缓和有关,美国也就失去了投入大量资源去推动区域研究的动力。尽管中美国情不同,不过中国的区域研究者也可以从美国的经验中吸取一些教训。目前“一带一路”俨然成为一种学术狂潮,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纷纷投身到中亚的区域研究中来。可万一形势发生变化,这种学术狂潮能否持续下去也是有疑问的。

三、如何应对挑战

美俄对中国在中亚影响力日渐壮大的担忧主要还在于这可能会损害到两国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因此,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需要通过一些利益置换将美俄的这种担心消减,以最大程度缓解来自他们的压力。鉴于美方目前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存在有限^①,我们也许更需要顾忌俄方的感受。后者由于近几年深陷乌克兰危机而遭西方世界制裁,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可能会减少,因而,中国为扩大在中亚影响力而需付出的代价相对也会少一些。

改善我国的中亚研究亟待我们行动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利用好两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方面是利用好中国中亚部分的智力资源库。以新疆为例,它是大中亚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通往中亚五国、阿富汗,甚至是蒙古国的窗口。作为新疆主要民族的维吾尔族绝大多数人是讲突厥语的穆斯林,与中亚各突厥语民族在历史上就有着密切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联系。维吾尔族对中国来说,是扩大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极好智力资源库,中国应该善于开发这个资源库,培养通晓大中亚事务的维吾尔精英,努力创造条件使他们中的部分人成长为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英,使他们参与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来。

^① 除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

第二个方面则是要利用好来自中亚地区的外部智力资源。以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为例,该系邀请来自中亚地区的语言学家专门担任本系的语言讲师,负责教授中亚地区的语言。此外,该系每年还会从中亚地区招聘若干学生教学助理,辅助语言讲师教授中亚地区的语言。尽管该系从事中亚研究的所有教授都会精通至少一门以上中亚地区的语言,但他们并不承担语言教学的任务。这么安排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保证学生能够跟母语人士学习语言,从而更有利于前者掌握所学语言的发音。再以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亚项目(Central Asia Program)为例,该项目每年会邀请来自中亚地区的社会精英来华盛顿 D. C. 作为访问学者,通过学术交流帮助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者更好地了解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一些意欲开拓中亚研究的学术机构完全可以借鉴印第安纳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成熟模式,通过引进中亚地区的外部智力资源,来加快培养自己的中亚区域专家。

至于如何规避在中亚从事田野调查的政治风险,这会是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需要认真考虑的。尽量不碰触敏感问题当然是一种保身之道,但我们也需要想象得到最坏的情况。在最坏情况发生时,身处海外的学者往往是很无力的,这就需要本国政府的强力支持。鉴于中国国力日渐上升,我们的政府有责任去保护在海外从事田野调查的学者,并在学者受到外部压力时及时给予必要的援助和支持,毕竟这些学者的工作说到底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不过国家并非万能,不可能帮助学者克服所有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中亚研究热退去后该如何自处应是学者自己的事,对此,每一个学者现在就应有自己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 胥涛. “一带一路”给我们的智识挑战 [J]. 经济科学, 2015(3).
- [2] 袁剑. “一带一路”中的中国—中亚关系: 常识重建与互为契机 [J]. 中国图书评论, 2015(9).
- [3] 张信刚. 大中亚与新丝绸之路 [J]. 财经, 2013(25).
- [4] Halford John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J]. Geographical Journal, 1904(4).
- [5] Andre Gunder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 [J]. Studies in History, 1992(1).
- [6] Christopher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7] E. Denison Ross, Vilhelm Thomsen. The Orkhon Inscriptions: Being a Translation of Professor Vilhelm Thomsen's Final Danish Rendering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1930(4).
- [8] Wei-chieh Tasi. Mongolian National Central Archives [N]. Dissertation Review, 2014-12-02.
- [9] Elliot Sperling. 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Text of the Tibeto-Mongol Treaty of 1913 [J]. Lungta, 2013(17).
- [10] David Brophy. *Tending to Unite? The Origins of Uyghur Nationalism* [D].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 [11] Thum, Rian.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2] U. 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R]. Hearing on Looking West: China and Central Asia, 2015.
- [13] Uzbek President Bans Teach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N]. The Guardian, 2015-09-05.
- [14] Jennifer Clibbon. How Alexander Sodiqov was Freed Following Espionage Charges [N]. CBC News, 2014-09-23.

【责任编辑 杨德亮】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Central Asia General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 Xu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hina's Western Frontie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Central Asia general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will be influenced by facts of weak foundation, the uncertainty of futur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ensitivity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sia studies. The challenges will be overcome by making use of the two intellectual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and overseas, it will help to overcome som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nd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on sense in Central Asia, the China and overseas intellectual resource database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Central Asia; General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